

# “自由人联合体”： 对乌托邦的反叛与升华

王 玉 琼

**摘要** 《共产党宣言》从理论基础、政治力量、物质条件等方面反叛、超越了传统乌托邦,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并为人类的未来揭示了新的理想——“自由人联合体”。这个“理想国”与旧的理想国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把社会理想、社会进步置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社会理想、社会进步必须具有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国家真正回归社会、社会与个人的自觉统一是未来“自由人联合体”最为本质的特征。

**关键词** 社会乌托邦 自由人联合体 实事求是

作者王玉琼,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福建厦门 361005)。

1848年2月,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描绘了全新的蓝图。今天,重温这部世纪名著,既是世界共产主义理论探讨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

## 一、传统社会乌托邦的特点与成因

“乌托邦”这个词源于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乌托邦》一书中构想的并着力加以描述的那个理想社会国家,一个完美无缺但也许是无法实现的社会,一个存在于某个乌有之乡的社会。为此,它成了种种想象中理想社会的通用名词。乌托邦的基础是乌托邦主义精神,即认为社会是可以改造的,而且是可以改造过来以实现一种合理的理想的。寻着这种理想作深入的历史性的考察,可以发现其首要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乌托邦思想:依靠某种思想或理想本身或使之体现在一定的社会改革机构中以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应当说,从最早时期的希伯来先知们起就表达过这种多少带有自觉性的理想,并提出重建社会的种种方法。

(一)从《理想国》(又译《国家篇》)看古代的乌托邦。《理想国》是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壮年时期

的作品,主要系统阐述其理念论及伦理、政治学说。当时正值希腊政治生活解体之际,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处心积虑,寻求国家强盛之道。首先,他从伦理与政治、国家与社会统一的角度指出国家是“善”的理念的实现、个人的放大。其次,强调智慧与权力的结合。指出只有哲学家才能按照善的理念来治理城邦,从而才能出现正义的国家。最后,为了消除现存城邦国家的种种弊端,主张在执政、保卫两个阶层实行共产共妻制度。由于阶级与时代的限制,他所描写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sup>①</sup>,即一种典型的理想的奴隶制国家。因此,它注定只能是一种反动的、虚幻的社会乌托邦。

(二)早期现代社会乌托邦主要反映的是16—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和资产阶级形成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是早期无产阶级要求的“象征、表现和先声”。其代表人物与著作有莫尔与他的《乌托邦》(1516)、安得里亚与他的《基督城》(1619)、康帕内拉与他的《太阳城》(1623)。这三部著作同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三颗明珠。这个时期乌托邦主义的特点是着重于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具体地说,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共有共享”的社会;主张政教合一,在安得里亚的基督城这一国度里,信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5—406页。

仰是第一位的,政治是为增进信仰服务的;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主张按照民主制建立城市联合国,莫尔构想的乌托邦就是一个由 54 座城市联合组成的国家;重视教育,把教育视为社会团结的重要媒介和巨大机会的阶梯。必须指出,这一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乌托邦思想家——哈林顿。与前三位不同的是,他在其政治乌托邦代表作《大洋国》(1656)里,主张创建合理的“财产均衡制”,同时强调法律的作用。为了保证政府的廉洁与健全并防止权力转移导致动乱,他提倡用无记名投票、间接选举、轮流执政和建立一个辩论与投票职能分立的两院立法制度等四种办法来加以限制。此外,还必须提到这一时期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1489-1525)的“千年王国”论。恩格斯说:“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sup>①</sup>。

(三)就 18 世纪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看,其代表人物与著作有:摩莱里与他的《自然法典》(1755)、马布利与他的《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巴贝夫与他的《永久地籍册》、梅叶的《遗书》(1729)、温斯坦莱与他的《自由法》、维拉斯与他的《塞瓦兰人的历史》。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sup>②</sup>。

(四)从 19 世纪初期的、即晚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看,其代表人物与著作有:圣西门与他的《新基督教》、傅立叶与他的《四种运动论》、欧文与他的《致拉纳克郡的报告》、卡贝与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1840)、德萨米与他的《公有法典》、布朗基与他的《社会批判》、魏特林与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其中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指出这些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其理论特点是:想要

立即解放全人类,用示范的办法建立理想的永恒的正义王国,而欧文则已经直接从法国的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具体地说,一方面,这些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等,则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来源。另一方面,他们由于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把它看成是“真正理性”、“永恒正义”的体现;不了解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鼓吹通过和平途径过渡到理想社会;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转向资本家及其他一切统治者乞求。所以,它们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这里,应该进一步指出,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莫尔、康帕内拉、马布利、圣西门等人的思想较为温和,其理论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群众运动的间接产物。他们是多数派、主流派。除少数例外,大多出身于上层统治阶级,代表上层知识分子。闵采尔、巴贝夫、卡贝、布朗基等人则不仅用自己的学说和纲领直接代表了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他们本人就是直接从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革命鼓动家、组织者和领袖人物。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他们是少数派、非主流派。除个别例外,他们都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来改造社会,在阶级斗争、革命、专政、政党、共产主义等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少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微光的观点。这两派的分离与对立,在社会主义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显然,这种分离和对立状态的结束有赖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 二、《共产党宣言》对乌托邦情结的反叛与升华

首先,《宣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及阶级斗争发展的高度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现状及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宣言》辩证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13—4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721 页。

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正如《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宣言》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掌握未来的阶级”。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把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与消灭阶级联结起来。据此,可以发现,《宣言》的基本理论既不同于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粗陋的共产主义”,也不同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其次,作为第一个现代党纲,《宣言》必然带着著作家个人所代表的那个政治团体的理想与信念。十九世纪上半叶,当各种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社会上流行,共产主义被欧洲的一切旧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等等)公认为一种势力并被诬蔑为“幽灵”时,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因如此,《宣言》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

再次,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宣言》非常强调现实的力量,强调实现理想的策略、途径、步骤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它“自己的发展进程”,必须遵循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依据

现实的物质经济条件,逐步取得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实现在于“取得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了极高水平,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化,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三、“自由人联合体”:一个新的“理想国”

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和进化思想的发展,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乌托邦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朝着某种绝对形式的社会,一种预先设计的、固定的、永不变化的社会发展状态就不再出现了。人们再没有必要提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国家,也没有必要给不完美的社会强加上一个完美的社会。事实正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人联合体”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我们之所以还称它是一个“理想国”,撇开其理论上的因缘与性质上的区别,只是就其时间上的未来状态与内容上的社会含义而言。与旧的理想国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规定与关心的是:

(一)必须把社会理想、社会进步置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理想绝不是子虚乌有、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人类要为之奋斗的是社会进步,而不是社会完善,是持续不断的变化,而不是停滞不前的存在。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家(包括柏拉图)并没有肯定能实现他们所抱希望的把握。他们的国家不仅是十全十美的,毫无变化和发展的,并且远离现世。马克思、恩格斯则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现实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样为着理想勇往直前的。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而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最终要达到资本主义时,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对邓小平进行电视采访时,问到:“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邓小平同志这样回答:“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sup>①</sup>。应该说,笃信马克思主义,一辈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地奋斗,这是邓小平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写照。今天,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十六大报告强调,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用“三个代表”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社会理想、社会进步必须具有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道德-宗教性的乌托邦思想家的设想完全是唯心的——全然远离现实世界。早期的现代乌托邦思想家也同样看不到整个社会集团在经济上应具有足够的力量这一点。同样,18至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空想的性质,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非科学性,而且在于理论发明家的非现实性。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解放的经济、政治条件,主张采取某些措施,首先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运动。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亲自加入了现实运动的行列,并密切注视现实运动的发展。今天,我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体现了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一切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都必须脚踏实地地加入这一建设行列,勤勉工作,奋发进取。

(三)国家真正回归社会、社会与个人的自觉统一是未来“自由人联合体”最为本质的特征。在对理想城邦、理想社会的探寻中,柏拉图先是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然后再用成立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建立国家的理由,从而令人觉得国家(实则是社会)乃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而莫尔则深刻地了解任何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的剥削实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富人可以假借国家的名义”。“他们表面上在代表国家,实则在为私利打算”。他认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是“富人的阴谋”,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制度——民主共和国——来与

上述制度相对抗。这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人民政权的原则之上的,这种政权由于没有私有制,以及由于全体官员需要选举并可以更换而得到了保障。在乌托邦,国家主要是作为一个监督并调节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机构而发挥作用。之外,莫尔在充分考虑道德作用的同时,把社会经济标准看成是他那完美社会最重要的准绳,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标准是国家关心广大劳动者的福利和幸福。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全体公民必须参加劳动并按需分配全部的生活用品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统一起来。莫尔的这些合理思想被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吸收。其中,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圣西门则明确提出了国家消亡的论断。至此,马克思主义仿佛回到出发点,但不是简单的重复,是更高阶段的回复,是否定之否定,是扬弃。

1、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用“自由人联合体”组织指称未来的社会,这既明示了国家的消亡、国家向社会的真正回归,又突出了社会固有的自治与平等性质。

2、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社会与个人的自觉与和谐的统一是未来联合体最高的理想与最大的特点。人类的差异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社会不是一个泛指词,而是一系列的人。乌托邦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缺陷:他们所持的全社会观点使得他们过于只从总体的角度看待人类。而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是见物不见人,而且非常强调个体的特性与发展。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仅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发展,而且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就把个人的发展提高到社会、集体与个人统一的高度。

3、实事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我们只能谈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因此,我们不能僵死、教条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把科学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